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文化体制创新

□范玉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部署，在文化领域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虽然《决定》中关于文化的部分不是全会亮点，但就文化自身建设而言却意义非凡，不仅把握了文化发展的规律，理顺了国有文化资产管理的关系，还提出了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改革方向和文化发展的战略诉求，对实现国家文化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政策指导意义。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

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体现了文化管理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管理的科学化标志着国家文化治理水平的提高。《决定》提出：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这次明确提出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既是对过去探索的肯定，又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不仅是完善文化宏观管理体制的重大举措，也是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方式的重要变化。在文化体制改革的深水区，如何实现国有文化企业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做大做强国有传媒企业，一直是困扰文化发展的政策瓶颈。《决定》提出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是意识形态管理方式的一大创举，有利于使转制后的文化企业更好地把握内容导向，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体现了形成符合现代企业的制度要求和文化企业特点的资产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要求的统一，有利于培育大型骨干文化企业，特别是文化企业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有利于破除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在尊重市场规律基础上提高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与之相应，在市场准入方面提出许可证制度，《决定》提出：“在坚持出版权、播出权特许经营前提下，允许制作和出版、制作和播出分开”，有利于明晰产权、打通全产业链和完善价值链。这其实触及到了文化改革深水区的一个政策瓶颈，那就是如何加强而不是削弱意识形态管理，既把握文化企业的特殊性，又能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从根本上解决了一直困惑国有文化企业的市场效益和导向之间关系的难题。这两方面的突破使文化管理制度逐渐完善，既可以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特别是新闻单位转制为企业，又可以让民营工作室和民间力量加入图书、广播电视非新闻节目制作，释放了文化产能，丰富了文化市场。这种制度建设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解放与不回避矛盾的决心和勇气。

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这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会提出在文化领域，要完善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有利于巩固文化体制改革阶段性成果，破除深层次潜在的行政资源配置方式的顽疾。事实上，我国文化企业难以在集约化基础上做大做强，一个最根本的症结点就是文化资源未能实现全国范围内流动。尤其是要素市场的不健全不完善，阻碍了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核心是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通过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才能把此前一直倡导的政府职能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落到实处，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实现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和当前变化的历史语境来看，只有通过文化资源的高效流动和整合，才能把握文化的发展机遇。《决定》强调“建立多层次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源相结合”，体现了中央政府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大力繁荣文化市场的要求。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效应，就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决定》提出“允许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改制经营”，从制度上激发了民间资本投资文化产业的激情，而支持各种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加强版权保护，不仅释放文化产能，有利于形成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共存，还提高了文化产业集约化发展水平，夯实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基础。

从文化市场视角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就是要通过市场的力量，破除事实上存在的“行政文化市场”，最大限度提供文化生产要素和文化商品流通的便利性，减少政府对文化生产经营的刚性干预，最大限度突破利益集团对文化市场不公平“定价权”，充分激活文化市场的公平与正义能量，建设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简政放权，优化资源配置，正是解决我国当前文化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关键。

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决定》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通过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对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出了制度安排。其中“标准化”是首次提出，有利于实践操作和保障公民均等化的文化权益。而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前面加上“现代”二字，则突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特征，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决定》提出明确不同文化事业单位功能定位，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是为了解决近年来改革过程中不同国有文化机构功能的混淆和低效率。强调“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着眼的是现实中的政事不分，通过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提升公益性文化单位的活力。

实现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目标，需用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引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破除条条框框，大胆探索实践，不断创新解放文化生产力的文化制度条件；充分运用服务文化的现代工具，发挥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形成的积极社会效应，调动大数据时代前沿科技成果向公共文化服务手段功能的转换，形成各种有效工具竞相迸发活力的蓬勃局面；使技术理性链接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开放性结构，引导各种社会力量投身公共文化事业，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从而提高国家文化治理水平。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样要围绕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中，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三者密不可分。如果没有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就不会丰富，就不会有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用于公共文化体系，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没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覆盖，就难以激发公民和社会共同参与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建设。创新文化运营机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转变政府文化职能，有利于建构企业法人治理、社团法人治理和国家治理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全球化语境下，只有开放，文化的力量才能更强大；只有开放，文化的影响才能更广泛；只有开放，才能有效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事实上，文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水往高处流，越是开放越能形成文化发展的高地，越能在全球文化博弈中占据制高点。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要明确文化“走出去”的核心。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把调动国内力量与借助国外力量结合起来，拓展广度、增进深度，形成对外文化交流的强大合力和整体效应。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要做强现代民族文化。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谁的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只有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和国际传播惯例，做强民族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并迈向价值链高端，以实实在在的文化贸易支撑版权输出。坚持内容为王，积极拓展传播渠道，大力推进国际传播本土化，以可沟通的中国话语，普适性的价值诉求，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和大众文化的运作机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要有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国内舆论与国际舆论相互影响的程度越来越深，内外宣传的界限越来越难以划分，做好对内宣传的同时，要积极改进对外宣传，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大外宣格局，为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决定》提出：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营管理经验。现在，世界各国在谋求增强自身文化对外影响力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维护本国文化安全。尤其在“网络自由”掩盖下的文化安全问题，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新安全观，迫切需要在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中，增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能力。国际经验表明：越是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就越能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文化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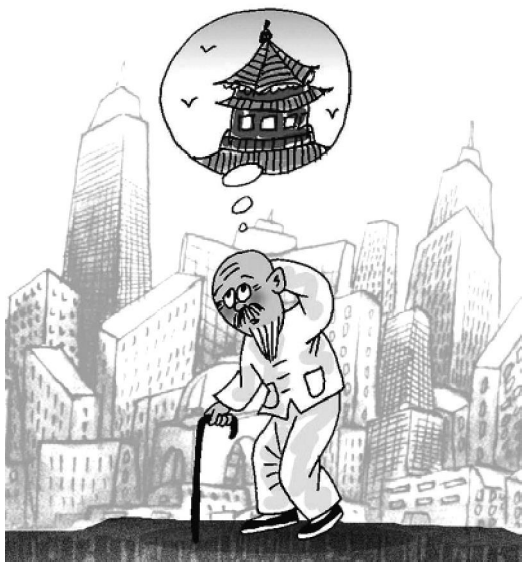
城镇化与文化传承

□郭秀丽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聚集，农村地貌变为城市景观，城市文化逐步覆盖农村，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向城市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变成或融入城市而消失。农村和城镇两大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景观形态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样态。从二者关系看，农村的发展与城镇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从文化的视角看，村庄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村庄是传统文化的自然载体。千姿百态的传统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村规民约等文化样态只能在村庄得以完整而富有个性的保留。而在城镇化进程中，原来附着于农村的各种文化元素有消有长，变化也是让人有喜有忧。

生活方式城市化了，但原汁原味富有个性的传统文化变淡甚至消失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居住、出行条件都有了空前的改善，生活方式文明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但随着自身居住条件的变化和邻里相识格局的变化，城镇化了的居民在节庆、婚丧嫁娶中的风俗也有了改变。旧有的看似繁文缛节的节庆活动、家族祭祀活动、婚丧嫁娶礼仪受到新的生活方式的制约，已不能再按原有的内容和程序进行，大都有了删减性的改变。随之，传统文化因素隐退甚至消失。从表面上看，城镇化了的农民生活变得轻松了，也有了诸如城镇广场、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活动场所，大众文化开始兴起。但城镇大众文化的同质性使得人们对过去那种原汁原味的文化活动又萌生了难以释怀的留恋和需求，甚至有人觉得生活的滋味没有以前浓厚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怀旧甚至失落的心理。这也说明文化的城镇化绝非像人口的城镇化那样来得迅速。城镇化过程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就像孔令宏先生在《试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的共时性》中所讲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进行思维的前提。”“传统文化还是使社会的各个部分、使社会的各个阶段保持紧密联系和统一性的东西，是社会发展的基因。”“作为对传统文化进行修正、补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现代化。”而我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更多注重了人口的城镇化、景观的城镇化，在和着城镇化的步伐中对传统文化的修正、补充、更新还缺少作为，多的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替代和抛弃，这就极易导致文化断层的发生。

生产方式变化了，与土地、天气等大自然有关的文化因素消失了。传统的农事耕作、放牧与土地、牲畜、气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农牧活动中，每一个村落都会形成多姿多彩的农牧文化，节气、天象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都是重要的因素，围绕着这些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例如，什么节气种什么庄稼、怎么饲养牲畜，看太阳月亮星辰云彩的变化也能辨识出时间、预报出天气的变化，等等。这些都是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最为宝贵的传统文化。不管现代技术多么先进，这些与大自然的有灵性的原始沟通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也决不能丢失，它是人类精神之源。对此，歌德慨叹过：“空气清新的旷野更是我们的天国。那儿仿佛有上帝的气息直接吹拂人类，那仿佛有神的力量产生影响。拜伦爵士每天在野外度过几个小时，一会儿在海岸边纵马驰骋，一会儿在船上张帆划桨，一会儿在水中游泳锻炼体力，所以成了古往今来最富创造力的人物之一。”我国宋代大儒程明道也说：“观鸡雏可以知仁。”如何让优秀的农村传统文化得以传承，使传统文化依然可以成为城镇化后人们的精神力量之源，是一个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分外注重的问题。



熟人社会的特点在城镇化后淡化了，与熟人社会有关的交往模式和价值取向受到挑战。每个村庄都是一个熟人社会，都有固定的约定俗成的交往模式和价值取向。熟人之间约束力很强，讲得更多的是情谊、诚信、友善和相互帮助，也更讲求公共治理的一些理念，有事大家一起协商解决。城镇化以后，原来的交往模式和价值取向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不得不发生各种各样的改变。虽然城镇中法治水平较农村高，法治文化也会有所发展，这是城镇化带来的积极影响，但好多事情绝非法治能包揽的。好多事情要靠道德、习俗等文化手段解决，解决起来摩擦小，成本低。市民社会被公认的弱点是狭隘、功利，优点是讲求独立、法治，极少干涉他人。城镇化后的农民变成市民，原有的文化传统因为诸多因素的改变派不上用场，势必会试着改变从而适应新的环境，因而原先的讲求情谊、诚信、友善和相互帮助的传统礼俗会逐渐变淡。城镇化水平越高，“礼失而求诸野”的情况会越多。文化传统中的那些优秀元素也就慢慢成为一部分人的集体记忆了。

城镇化是我国的大政方针，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追求，诸多益处自然不用再一一赘述。但任何一项好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并且警醒解决。城镇化对于文化传承，有利有弊，但就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来看，弊端显现明显，好多做法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这就要求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注重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文化现代化，使城镇化后的农民在旧有文化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依然能得到文化的浸润，仍旧有传统和现代结合得很好的文化作精神支撑，使农村的优秀传统文化很好地和城镇融合，生发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就像日本学者河西太一郎在他的《农民问题研究》中描绘的一样：“再把这样几百年以后的人类群众生活想象一下……农工业的调和，同农村和都会的融合，乃是那个社会的底色。在那社会所存在的，可以说是‘农村式的都会’或是‘都会式的农村’……那样的时代的文化才能算是真意义的人类的文化。”

文化视野

完善考试招生制度的现实路径

□郑 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为当前的教育考试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教育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考试招生制度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自古就受到高度重视。世界任何国家的考试制度都存在遗漏贤能的可能性，但在现有社会条件和认知水平下，尚无更好的制度能够完全取代考试制度。故如何改革完善考试招生制度，在确保考试公平性的同时，又能最大限度确保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当前我国考试招生制度存在的问题有：管理过于集中，行政权力主导的统考、联考颠倒了考试与教学的因果关系；单次考试成绩决定性作用成为学习的强迫性压力，而非教育本质中对学习的激励作用；盲目追求升学率、通过率等量化数字指标引发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和个别学校违规操作等。这些都亟待我们改革创新考试招生制度。

第一，专业组织实施，确保考试公正。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实现考生公平教育权的主导手段，因此考试的公正性、科学性至关重要。美国 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考试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约 4300 所美国大学共同组成的文教组织）委托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ETS）定期举办的测验，SAT考试成绩是美国各大学申请入学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美国SAT考试是一种自下而上、民间性质的考试，注重对学生学术能力的科学测试，强调“学什么考什么”的科学导向。目前我国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招生主要都是由中央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命题实施。由于行政权力对教育资源的支配性，这种自上而下、由官方组织的权力主导型考试必然导致教育中“考什么学什么”。我国行政权力主导型考试招生制度不改，应试教育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只有建立权威、独立、专业的考试组织机构，真正将考试权交由专门机构实施，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负责宏观指导、监督检查，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在形式上，考试组织机构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防止考试作弊行为，建立全国统一的考试诚信档案，杜绝因为考试作弊而使考试制度的公平性基础被破坏。国家应尽快制定考试法，规范考试制度，使考试有法可依。早在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在借鉴西方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吸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特色，增设“考试院”和“监察院”。其中考试院就是为避免“盲从滥选”和“任用私人”的弊端。这一思路可资借鉴。

第二，增加考试次数，提供多种选择。一年一至两次的高考，受到考生家庭和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无形中既增加了考生的心理压力，又增加了考试组织管理的工作负担。SAT考试一般一年举办 7 次，学生缴费即可参加考试，没有考试次数限制，直到考出自己满意的分数为止。托福（TOEFL）、雅思（IELTS）考试一般每个月举办 2~4 次，只要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即可参加考试。澳大利亚的高考制度以高中两年的综合成绩和“全澳等级考试”成绩来综合评定学生的大学录取分数，而不是以一次考试的成绩作为大学录取的标准。增加考试次数本身并不意味着学习压力的减少，而是能够较好地避免考试成绩的偶然性，更强调主动学习的重要性，使考试成为一种能力检测手段和学习激励导向。此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也应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由考生根据自身复习情况选择报考时间、次数，提供多次选择机会，增加考生自主权，更加合理地测查考生的知识能力，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第三，依法自主招生，推进教育民主。教育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要赋予高校依法自主招生的权力，允许高校根据自身特色设置不同的考录标准，实施考试和推免相结合，笔试选拔和面试测查相结合，排名招录和教师推荐相结合，教育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对自主招生的程序和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各高校可以在招生中增加自主面试、科研水平考核所占权重，更为注重特长能力及平时参加社会实践、社团活动、志愿活动、学术比赛的表现等。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学校都会根据自己的特色和标准，对入学申请者进行综合性测试，其成绩也纳入录取标准之列。当然，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权的前提是确保自主考试招生的公平公正公开。特别是在目前社会整体诚信度尚不高的情况下，公众必然对教育公平有更高期待，要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出现人情招录、金钱招录等腐败现象践踏教育公平。要强化信息公开，避免暗箱操作。将考试程序、考试结果、评价尺度、被推荐人和推荐人情况全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提高社会认可度。高校如能增加考试次数，实施自主招生，学生有多次选择机会，那就意味着在我国也将出现一名考生同时获得多所高校录取通知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考生最终选择哪一所高校将综合考虑学校办学历史、社会声誉和学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在高校优胜劣汰考试招生体制下，高校必然会对教育供求作出灵敏的反应，以保证办学方向的准确性，吸引更多学生报考。

考试招生制度是国家人才选拔的重要形式，具有评定、预测、导向和激励作用，也决定了社会成员受教育和社会阶层流动机会的公平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应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批判性思维和学习内驱力，健全完善考试立法，实现以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的现代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教育问题谈